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
学术研究史丛书

文学专辑

傅璇琮 主编

齐裕焜

王子宽 / 著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社
問
何
鄉
文
論

福

版
社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文学专辑

傅璇琮/主编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 齐裕焜 王子宽/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齐裕焜, 王子宽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6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ISBN 7-211-04650-3

I. 中... II. ①齐... ②王...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3099 号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ZHONGGUO GUDAI XIAOSHUO YANJIU

齐裕焜 王子宽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市晋安文化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飞路湖前井大 39 号 邮编: 350012)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14.5 印张 2 插页 386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11-04650-3

I·121 定价: 25.7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出版说明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 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 20 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 20 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其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

1998 年初，我社与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清华大学教授刘石先生共同筹划编纂一套反映 20 世纪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的丛书，并定名为《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后，我们约请到傅璇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四位先生担任丛书主编，并由他们规划框架，制订体例，拟定选目，延聘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承担编写工作。

在诸位学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下，这部涵盖文学、史学、哲学三大系列近 30 册的丛书终得面世。从酝酿到成书的六年间，人类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世纪工程”。中国传统学术包容广博，蕴涵深厚，讲究“一致百虑，殊途同归”。20 世纪的中国人文学科，亦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特质。唯其如此，这套丛书的选题



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学术定位是，不仅限于对各学科百年学术研究面貌的勾勒和研究成果的综述，同时也力求结合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从学术思想的起伏演变探索 20 世纪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得失成败。通过历史反思来探寻规律，获取经验，为新世纪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至于各书的布局和风格，亦不强求体例的划一，旨在充分发挥作者的创造性思维，驰骋其表现才能，以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们高兴地看到，就在这部丛书面世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意见》并指出，要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比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体会《意见》的精神，我们更加感到这部丛书的出版正逢其时。我们希望也相信这部丛书能够为《意见》中所指出的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等做出自己的贡献。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

目 录

第一章 回望 20 世纪前之小说研究	(1)
第一节 宋以前小说研究的雏形	(1)
第二节 明代小说研究之异军突起	(10)
第三节 清代之小说研究巅峰	(21)
第二章 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1900—1930) ..	(39)
第一节 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研究拉开帷幕	(39)
第二节 梁启超的政治解读与王国维的文学批评	(43)
第三节 蔡元培与索隐派	(66)
第四节 胡适、俞平伯与考证派	(73)
第五节 鲁迅与小说通史派	(94)
第六节 资料收集与小说目录学的兴起	(108)
第三章 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1931—1949)	(116)
第一节 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和批评派的兴起	(117)
第二节 考证派的进展	(130)
第三节 小说目录学的成就	(136)
第四章 社会历史批评占主导地位时期(1949—1965; 1966—1976)	(142)
第一节 在曲折中前进	(142)
第二节 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工作的进展	(148)
第三节 索隐派在大陆的沉寂和在海外的兴旺	(168)
第四节 社会历史批评成为主流	(170)
第五节 古代小说研究被严重扭曲的时期	(218)



第五章 古代小说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上)(1977—2000)	(224)
第一节 拨乱反正,古代小说研究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224)
第二节 小说目录日益完备,资料工作成果丰硕,作品出版形成热潮	(230)
第三节 回归实学:作家和版本考证成为热点	(236)
第六章 古代小说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中)——清代之前小说的文学批评(1977—2000)	(303)
第一节 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主体性批评构成多元化批评的新局面	(303)
第二节 《三国演义》研究	(306)
第三节 《水浒传》研究	(324)
第四节 《西游记》研究	(334)
第五节 《金瓶梅》研究	(341)
第六节 文言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研究	(358)
第七章 古代小说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下)——清代小说的文学批评(1977—2000)	(373)
第一节 《聊斋志异》研究	(373)
第二节 《儒林外史》研究	(382)
第三节 《红楼梦》研究	(399)
第四节 其他小说研究	(421)
第五节 小说史研究的热潮	(438)
结束语:展望 21 世纪之小说研究	(448)
主要参考文献	(456)
后记	(457)

第一章 回望 20 世纪前之小说研究

第一节 宋以前小说研究的雏形

20 世纪对中国而言，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百年，尽管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还只是一个短短的一瞬间。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其变化则不仅显示为一种量的无可比拟，更显示为一种质的飞跃，百年前的学者，无论其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恐怕也难以想象今日小说研究之盛大。因此，研究这一百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变迁，探讨其演变的规律，总结其得失成败的经验，展望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对 21 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这些有幸身跨两个世纪者义不容辞的一件事。小说研究是一条澎湃东去的大河，下游固然辽阔壮观，但它离不开上游的涓涓细流。今日的小说研究是在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天还有借鉴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关注 20 世纪小说研究的时候，自然也不能不回望古人在小说研究方面所走过的曲折历程。

“小说”这个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从现存古代典籍看，它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中：“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所说的“小说”亦即他在《齐物论》中批评的所谓“小言”，是一种浅识小语，庄子讽刺浅薄之徒企图以一些无知浅语粉饰装点自己，以求美誉，这种浅薄之语与真正的大道理（大达）是相距甚远



的。因此，庄子的“小说”与我们今天讲的小说并不是一回事，但“小说”一词则为后人所沿用，其语义内涵渐渐衍变趋同于今日的小说。东汉桓谭（约公元前23年至公元50年）《新论》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①桓谭说的“小说”，定义与今日已有相近之处。到稍后的班固时代，小说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汉书·艺文志》载录15家古小说，计1380篇，班固将“小说家”列入诸子十家之末，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②班固是一个很正统的史学家，他以史家的目光审视小说这一文学现象，他的评论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其一，他以一个正统儒家学者的眼光来看待小说，对小说比较轻视。他在随后的论述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被摆入不可观之列，“致远恐泥”，“君子不为”。他的观点比桓谭落后，桓谭还认为小说在“治身理家”方面有可观之辞。儒家正统思想对小说的轻视，长期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与研究，始作俑者班固自有不可推辞的责任。其二，他指出小说源自民间，同时又在民间流传，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尽管君子不为，它依然“弗灭”。其三，小说具有比较大的虚构与传说成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这实际上涉及了小说创作中的虚构问题。应该承认，后面这两点还是说得比较准确的，说清了小说的来源及最基本的特征。

班固的小说观影响十分深远，他的论断实际上涉及小说批评中三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对小说价值意义的评判，对小说通俗化意

①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人，所著《新论》二十九篇久佚，后人辑有本，此处转引自《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李都尉陵从军》李善注，见中华书局影印《文选》胡克家刻本第444页，1977年版。

② 班固：《汉书》，第174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义的评判，对小说虚构意义的评判。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古代小说批评都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争论的。

到了汉晋六朝时期，小说已开始风行，现代的小说史著都将此时的小说大略地分作两类：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前者如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后者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殷芸的《小说》等。^① 魏晋时期人们在评价这两类小说时，首先注重的是小说的真实性及其存在的价值，把小说的真实性看作是小说存在价值的前提。所谓真实在他们眼里就是事实、史实，他们没有把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区分开来，对小说真实性的理解过于狭隘、简单。他们把小说与历史混同起来，要求小说的真实性要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性，一旦其真实性受到怀疑，则小说的价值便一落千丈。对小说的这种理解应该说是小说研究初始阶段的一种幼稚观点。尽管如此，作为古人在小说批评方面的最初尝试，也还是有意义的。

在志怪小说领域，魏晋人首先竭力申明的是神鬼怪异的真实可信，亦即干宝在《搜神记》序言中所强调的“明神道之不诬”的意思。儒家传统思想是“敬鬼神而远之”，是“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之事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但是，由于古代人们对社会、自然认识的不足，对一些社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产生一些神鬼怪异的故事也是很自然的。加之东汉之后，道教的盛行，佛教的传入，社会的黑暗，名士清谈的需要，种种社会原因，都促使了志怪小说的产生与流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仅 15 种，到了魏晋时期，

^① 这种分类大抵依据鲁迅的判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著作中已经有志怪、志人的分类，今人有将之细化者，如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将志怪细分为记怪、博物、神仙三个小类，将志人改题为轶事，并细化作笑话、琐言、轶事三小类；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将志怪类细分为地理博物、鬼神怪异、佛法灵异，志人类细分为笑话、野史、逸闻轶事等。

仅志怪小说已近 30 种，由此可见其风行之一斑。志怪小说的内容与儒家传统的思想发生了矛盾。志怪小说要在儒家思想笼罩一切的背景下生存、发展，首先就必须证明志怪现象的可信性，证明志怪小说并没有违背儒家的传统，这就是魏晋时期许多小说作者纷纷站出来申明志怪小说存在合理性的原因。在此类议论中，以郭璞的《注〈山海经〉叙》和干宝的《〈搜神记〉序》最为典型。郭璞《注〈山海经〉叙》提出一个观点，即世间种种所谓的“异”，其原因皆在于“我”的观察角度：“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① 他以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来解释怪异现象，这有其合理的一面，有些在当时看来是荒谬不可解释的事物、现象，到今天已经有合理而科学的解释。但是，如果由此引申说一切荒谬之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则显然不妥，郭璞只是借此为志怪小说申辩罢了。干宝的《〈搜神记〉序》则从另一个角度为志怪小说申辩：“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如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②

干宝首先论证各种传说异闻存在的合理性，即使是儒家经典，也难免有互相矛盾的异闻，志怪传闻并没有违背儒家的传统。然后说明传说异闻其于历史的功用是要大于它的负面影响的，进而证明记载传说异闻的志怪小说，不仅有其存在的理由，也有其实际的功用。干宝的说法比郭璞更为合理而全面，尽管他最后得出的“亦足

① 袁珂：《山海经校注·附录》，第 47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汪绍楹校注：《搜神记》，第 2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以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结论是错误的，但由此而保存下来的志怪小说，对我们今天的小说史研究却很有意义。由于儒家文化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强大而长期的影响，证明志怪小说存在合理性始终是必要的，甚至到清初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时，人们还在进行着这一类的论证工作，可见郭璞、干宝等人当初为志怪小说所作的申辩并非多余。

志人小说方面对小说的真实性就更为重视了，在当时人看来，一旦志人而与事实不符，这小说便一文不值。东晋裴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①从当时人们的反应看，这当是一部相当受欢迎的志人小说。后来只因为其中记载谢安的话失实，受到谢安批评，^②这部长达 10 卷的著作便从此不再流行，终至散失。鲁迅《古小说钩沉》曾辑录《语林》文字 180 条，并认为《世说新语》大概就是纂辑《语林》等书的旧文而成的，可见《语林》一书之价值。只因在真实性上有一点小的失误，竟遭时人鄙弃，这实在有点可惜，连《续晋阳秋》的作者也感叹说：“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③史书需要真实，而要求小说创作也要如史书般的真实，把小说等同于历史，这既不符合小说的规律，也不是小说批评应采取的态度。从这些材料看，在小说创作的初始阶段，人们对小说创作的规律未能完全掌握，对小说的批评自然也未中肯綮。

到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传奇开始盛行，人们“始有意为小说”（鲁迅语），一时蔚为风气，其影响所及，甚至远播海外。令

① 事见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 269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② 事见《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及注引《续晋阳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 844 页。

③ 语见《世说新语·轻诋》注引，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 844 页。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许多文人虽然热衷创作传奇，却无意于小说的批评，小说批评大致还停留在魏晋人的水平上。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则有些传奇作者已不再拘泥小说的真实性，转而强调小说本身的文采及讽世的作用，这或者可算是唐人在小说批评上的一个进步。沈既济《任氏传》末的议论，强调了传奇的作用：“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翫风态而已。”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传奇小说都有明显的寓意，作者也不故意回避其小说的虚构性。《南柯太守传》末作者的一段叙述，大概可以代表唐人创作此类作品时的心态：“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觐淳于生棼，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属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这段话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李公佐把自己的经历写入小说，真真假假，亦虚亦实，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其意图还是想在小说中增加真实性的成分，以便抬高小说身价。这种把自己写入小说的情况在唐传奇中很常见，李公佐的《古岳浚经》、《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都把作者自己写入，元稹把自己的经历写入《莺莺传》，沈亚之《秦梦记》写自己做梦的故事等，究其动机，大概都是想借此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可见唐代传奇作者在真实性面前，还是显得有点自卑，理不直，气不壮，不敢大声宣布小说虚构的合理性。其二，尽管小说作者再三强调故事的真实性，但如《南柯太守传》、《枕中记》之类小说，只要是判断力正常的人，都会一眼看出它们的虚构意味，对于这一类虚构，作者是不可能，事实上也无意去掩盖的，唐人是有意在“弄虚作假”。明代胡应麟已经看出这一点，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里指出：“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中也说唐传奇“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作意好奇”、“究在文采与意想”指的就是唐人创作时凭借想象有意虚

构，这与魏晋人谨守真实者大异其趣。唐传奇在虚构方面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虚构，如《柳毅传》、《东阳夜怪录》等，这种虚构可一眼看出，作者大概正想借此表现他丰富的想象力；另一种则是借用真人之名，虚构假托之事。这种故为狡狴之笔的虚构最易迷惑人，使故事既有一种可靠的依托，增加可信性，又有一种新鲜感，增加可读性，这是唐传奇中最常用的虚构方法。小说如果不从历史真实中分离出来，进而大胆申明小说虚构的合理性，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唐人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在理论上却不敢公然申明其合理性，这在小说批评史上应该是一个遗憾。其三，从李公佐的创作动机看， he 已经开始自觉地、明确地在小说中寄托自己的思想，以小说的形式来干预社会，他的传奇乃为时而作为世而作，非为艺术而艺术，这给中国古典小说开了一个好头。中国古代经典式的小说总是愤世之作，这种“假小说以寄笔端”的创作思想则自唐代传奇始，这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宋代对小说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为对古代文言小说的大量收集、整理、分类方面，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初年李昉等人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这部书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开始编，至次年八月编成。全书 500 卷，专门收集汉初至北宋初的野史小说，所引用的书籍达 475 种，^① 这些引用书籍有半数以上今已散佚，更显得这部书在研究宋以前小说史方面的价值。尽管这部书是奉宋太宗命令编纂的，李昉在《〈太平广记〉表》里还是表现了对小说看法的进步，他认为“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把小说提高到可以与六经并重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此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因而更显得其可贵。

^① 此据《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点校说明》的统计。

洪迈（1123—1202）在晚年编成《夷坚志》，这是南宋影响最大的文言小说集，主要载录宋代的志怪故事。全书原有420卷，分为初志、支志、三志、四志，每志又分作10集，以甲乙丙丁天干顺序编次，原书大概在南宋末年即有散佚，《宋史·艺文志》所载的卷数已与原书不符，^①今存206卷。洪迈《夷坚乙志序》云：“《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②可见这部篇幅巨大的志怪小说集在当时即受到广泛的欢迎，同时，这种风尚也促进了南宋说话艺术的繁荣以及话本小说的诞生。

“说话”即说故事，“说话”这种娱乐形式由来已久，唐代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到南宋则相当盛行，并呈现出职业化、商业化的特点。发生在北宋末年的宋江农民起义，到南宋就衍变成为在民间广泛流行的说书故事，市井传闻迅即成为“说话”的材料，说明“说话”艺术发展之快。正因为它有着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引起文人的重视与评价，而“说话”艺术正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滥觞。宋代小说批评中最有价值的是对“说话”艺术的评价。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罗烨《醉翁谈录》等书都有关于宋代“说话”艺术的记载。这些记载大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说话”进行分类，大都分为四类：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合生也作“合笙”，它是否属于小说范畴还可讨论，而前三种则一般认为当属小说。其中对小说的分类更细，分作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等，显示出文人对说话艺术之关注。二是探讨了“说话”艺术的特点及功用，罗烨的《醉翁谈录》对“说话”艺术，其实也就是对话本小说艺术作了很充分的评价：“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

^① 《宋史·艺文志》录《夷坚志》甲乙丙60卷，丁戊己庚80卷，与原书420卷相去甚远。

^② 语见洪迈《夷坚志》第18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之愚者可戒。言非无根，听之有益。”这里说的是小说的社会功用；“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强调说小说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啣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点明了“说话”艺术的感人力量。^①罗烨当是宋元之际的人，在他之前，还没有谁对通俗文学做出这么高、这么全面的评价。就通俗小说作用而言，他强调小说可“为师”、“为戒”；对那些从事小说活动的艺人，罗烨作了非常高的评价，他们必须幼习长攻，必须无所不览、无所不通；他高度评价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这在以往的小说批评中是很少提及的。宋代的说话艺术有如此强烈的感人力量，这是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又是说话艺术职业化、商品化的结果，如果说话艺术还只是停留在唐代文人茶余饭后闲聊的基础上，^②恐怕是很难达到这种境界的。

宋代发达的“说话”艺术，揭开了明清通俗小说繁荣的序幕，同时也扣开了明清时期小说批评的大门，使得明清小说批评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明清时期的小说批评，无论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远迈前人，而非唐宋诸贤所能比拟。

^① 以上引语分别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第 87、88、89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迟”句下自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卯未毕词也。”传奇《李娃传》末作者白行简曰：“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与白居易、王质夫等人“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即唐玄宗杨贵妃之事），相与感叹”。唐代诸如此类的记载颇多，都证明唐时文人有的在业余时间“说话”的习惯。但他们之“说话”，不过是客串而已，非专业说书者。